

再论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历史原因

蔡天新, 陈明德

(中共莆田市委党校, 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理论上讲,这种选择既是坚持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探索;实践上看,既借鉴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又总结了中国战时的经济建设经验;从客观条件分析,计划经济既由落后的国情所决定,也包含着实现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从主观原因看,既是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措施。从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选择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思想占主导地位,但究其主观因素背后的动机则仍然受客观条件所支配。

关键词: 新中国; 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 工业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 F123.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1)05-0070-06

引言

邓小平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也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和阶段性经济发展目标,采用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宏观调控等多种经济手段,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自由经济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还是市场经济的地区,都要营造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经常性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才能使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最佳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周边国家的严重衰退形成了巨大反差,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再度重视。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法、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计划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以制止本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何种经济体制,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手段,其原因是复杂的、客观的、动态的,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愿望占主导地位,但只要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主观动机的背后仍然受客观条件所支配,偶然性背后仍然是必然性在起作用。

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

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从指导思想上讲是有理论依据的。即为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希望将中国建设成为高度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性质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朝共产主义目标不断前进,这既是中国共产党

收稿日期: 2010-11-25

作者简介: 蔡天新(1955-),男,福建莆田人,中共莆田市委党校教授,研究员。

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也体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这种做法从理论上讲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虽然说这种选择的时机是动态的,其实践也可能出现反复,但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计划经济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却是必然的。尽管目前我们正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不等于说计划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终结了,也很难说中国将来再也不会出现计划经济。恰恰相反,昨天的计划经济实践为今天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而今天的市场经济可能又为明天的计划经济创造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经济体制同样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更替、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交叉出现,市场经济中需要有一定的计划,而计划经济中也有市场调节在起作用,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单纯的计划经济。自由经济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发达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最终导致计划的不断加强和宏观调控力度的增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所以,计划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带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即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再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对立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产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发展壮大,必然导致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最终会战胜资产阶级,推翻其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以及人们劳动自觉性的不断提高,人类最终会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之后,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固有的劳资矛盾,就必须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活动,才能调动全体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遵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指导下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活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根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与探索。所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老一辈革命家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过于迷信前苏联的经验,照搬照套,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受挫。然而,即使这种选择可能在某些方面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实际,那也只是国家领导人的一时失误,并不能证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错误,更不能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

二、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和战时经济建设 是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实践依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从实践上看主要基于2个方面因素:一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和成功经验;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战时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

首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建国初期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主要实践依据。苏联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并全面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34.5%,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发展速度。苏联的生产力状况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都处于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小农经济阶段。同时,两国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浩劫,国家经济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均处于崩溃边缘,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几乎都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新建设。而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在短短的11年间(1945—1956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但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解决了战后的国内经济危机,而且还发射了人造卫星,率先进入了太空,甚至成为了超级大国。而英国、美国、法国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不义之财,但仍然摆脱不了经

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困扰,且年均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不超过个位数。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援建了新中国156个重大项目。这种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尤其是技术上的支持,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办不到的。站在那个时间点上,谁还会说计划经济不好,市场经济好呢?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派刘少奇专程到苏联学习取经,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政策、财经措施、统计方式等方面,全部照搬照套苏联模式。这种选择当时恐怕没有多少人持反对态度,即使不是毛泽东等当政,其他领导人也会做出这样的历史抉择。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苏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探索也是建国初期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实践依据。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计划经济建设尝试。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苏区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建立国营经济。中央红军一方面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一方面积极创办具有公营性质的企业,如机械厂、服装厂和粮食加工厂等。毛泽东曾经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2]。在军工企业方面,中央红军还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织布厂和制药厂等。苏区地方政府也创办了煤矿、钨矿、铁矿和粮食生产等企业。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争年代,这些企业都实行军事管制,在生产计划、原料供应、物资调配、产品分配、人事管理等方面,均采取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计划经济的雏形。正如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3]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在延安、皖南等敌后革命根据地创办了一些枪械厂、纺织厂、被服厂、制药厂、食品加工厂和红军农场等,这些战时企业也采取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进入解放战争后,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

大中城市。为积累城市经济建设经验,中共中央派陈云、张闻天等人在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进行经济建设试点。为了保证新旧政权交替期间的社会稳定,城市接管后大多实行军事管制,采取统一的财经政策和金融政策,并对大、中型企业和粮、油、棉、煤、电、邮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国家专营制度。这些计划经济管理措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实施的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

三、经济落后的国情是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客观原因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归根结底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新中国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贫穷落后的初级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必须举全国之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才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计划经济是最有效的手段。

首先,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很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看,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政权是有好处的,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是走的这条路。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加上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但由于农村生产力极其落后,农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穷困潦倒,没有积累,虽然得到了土地,却没有能力改善生产工具。加上单家独户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既缺乏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又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并没有像毛泽东等人所想像的那样,广大农民能迅速地富裕起来,而是出现了使共产党人意想不到的现象,即由于劳动力及经济上的差异,分得土地的农民又很快地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经济较好和劳动力充足的家庭很快地添置了生产工具,雇起了长、短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并迅速富裕起

来。另一部分农民,因缺乏劳动力或天灾人祸等而越发贫穷下去。这种状况既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初衷,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容许出现的现象。所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立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尽快地摆脱贫困。同时,通过计划经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条路苏联也走过,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国当然也可以试一试。

其次,计划经济是生产力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出现资金短缺。从农民的情况看,大多数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不可能有剩余资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看,旧中国时期,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数量很少,又基本上由官僚资本垄断,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和外资的排挤非常严重,生存困难,发展缓慢,规模很小,资金短缺,不可能投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且大多数私营小企业正处于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不可能将自己有限的资金投向国家急需的重工业和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这种生产力状况,如果单靠民间的原始积累及资金投入实现工业化目标,不但周期长、进程慢,而且效率低、质量差。加上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手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新中国根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本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不足。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实施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行政权力将全国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对重点工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以及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和公共产品进行集中投资建设,才能加速中国初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再次,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为计划经济的实行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特点,即封建官僚资本占整个工业的大头,其他资本只是官僚资本的附属和补充。从1949年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比例看,官僚资本占总资本的64.1%,形成绝对优势;民族资本虽占总资本的24.7%,但对官僚资本又有很强的依赖性;外国在华资本占总资本

的11.2%,却与官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也为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变成了国家资本,剩下的民族资本便成为国营经济的附庸。据1950年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共接管了2800多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和2400多家金融企业,构成了国营经济的主体部分^[5]。随后,国家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专营,客观上形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国营经济为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辅的经济框架,为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巩固新政权和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 是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主观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观因素,但作为一个领导群体的主流思想,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否则,一切美好的计划都会变成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一个执政党的主观愿望都是客观实在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体制的选择,也不可能是毛泽东等人的凭空想像,偶然性背后仍然有必然性在起作用。

首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选择计划经济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新中国是建立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基础之上的新型政权,这种政权必然会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仇视和反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国际上立即掀起一股反华浪潮,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采取政治上攻击、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等多种手段,企图扼杀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国内,国民党集团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其失败,始终敌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从事政治颠覆和破坏活动。在政治上,国民党特务组织经常性地制造恐怖事件,杀害党政干部,策划武装叛乱,经常在公共场合实施爆炸破坏,搞的人心惶惶。在经济上,台湾当局遥控潜伏大陆各地的特务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实施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尤其是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一些不法奸商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操纵下,囤积粮食、棉布、食盐等重要物资,拒用人民币,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制造谣言,扰乱人心,企图通过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达到打垮新政权之目的。在综合国力上,经过8年抗战和4年内战的新

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共产党虽然建立了新政权,但整个国家内外交困,经济危机,矛盾凸显,百废待兴,广大民众和各民主党派都拭目以待,希望中国共产党出台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措施,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如不掌握经济命脉,社会主义新政权就不能巩固;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就不能有效地控制物价,稳定市场供应,保障人民生活;如果不控制重要物资,就不能粉碎不法奸商的扰乱和破坏活动;如果没有掌握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就难以抵御外敌的入侵,粉碎敌对势力颠覆新政权的阴谋活动。

其次,计划经济也是维护执政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是穷人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这一政权的核心就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执政者只有别无选择地在一切利益上必须站在广大穷人一边,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这些穷人当中,有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有的是在敌占区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有的则是在战争中无私地支援前线的广大民工,还有一部分人却是在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后代。作为执政者的一切决策必须照顾到跟随他们多年的有功之臣,必须体现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让九泉之下的烈士们瞑目。否则,浴血奋战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就失去了原来意义。所以,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可能选择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经济,也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任意发展,更不可能让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和革命烈士后代重新给资本家打工。站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间点上,面对着左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右边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即使谁优谁劣问题一时难以界定,但从保持住革命者和全国穷苦人一段时间上的支持来讲,中国的执政者也必须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这不但是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因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将全国的企业利润集中在国家手里,将全社会的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然后进行国民经济第二次分配,以确保革命功臣、烈士后代和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

再次,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出现偏差也是建国初期将计划经济作为唯一选择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党懂马列的不多,许多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一知半解,正是由于大多数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才把计划经济当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唯一选择。从理论上讲,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党上下都错误地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马克思曾经设想的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错误理解为单纯的计划经济,把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教条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6]的理论,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且发展不平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经历自由竞争的商品发达阶段,而是把天生不足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发达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党内左倾思想恶性膨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与马克思理想中的计划经济画等号,形成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定向思维。从实践上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不长,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又被苏联社会主义的暂时成功所陶醉,导致中国领导人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照搬了斯大林的错误理论,使计划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度,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思想又十分浓厚,普遍存在着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思想倾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成为计划经济的保护伞,使人们对计划经济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尤其是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既传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均田”、“均富”、“均贫”的“大同世界”思想,又适应中国人“不怕穷,只怕患不均”的传统思维方式,导致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受青睐。然而,尽管这些主观思想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究其主观因素背后的动机仍然受客观条件所支配。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

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从历史的视角看,计划经济出现在建国初期绝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去研究,从科学发展观高度去审视、去认识,才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当然,现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选择计划经济的历史原因,并不是为

毛泽东等人的失误辩解,如果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能正确把握计划经济的原则性与经济建设实际中的灵活性,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及时调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促进经济社会保持稳定、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不会如此艰难曲折了。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373.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911.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30.
- [4] 黄金家. 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必然性[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1):84-85.
- [5] 彭德望. 辉煌壮丽的历史画卷——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EB/OL]. 湘潭史志网,2010-01-14.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3.

Re-Comment on the Historical Reason for New China's Choice of Planned Economy

CAI Tian-xin, CHEN Ming-de

(Putian Municipal Part School of CPC, Putian Fuj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in choosing planned economy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Theoretically, the choice not only sticks to Marxist scientific socialism, but also is a great explor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actically, it not only draws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former Soviet Union, but also summarizes the economy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of wartime China; objectively, choice of planned economy not only is determined by the backward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implie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bjectively, it is not only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new socialist regime, but also the effective measure for safeguarding the essential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t seems that the subjective thoughts of the leaders of CPC and the state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hoosing planned economy, however, the motive behind such subjective factors is still subject to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Keywords: new China; planned economy; socialis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世红]